

西窗嘉话

“江风吹醒少年的黑发”：家乡求学时的袁可嘉

方向明

袁可嘉的小学 and 初中，都是在家乡读的。7岁到16岁这十来年，袁可嘉《自传》里仅有短短的十来行：

“1928年我七岁时进入当地庆德小学学习，喜爱读课外书。当年家中藏有一些旧书报，又有长兄带来的新文学书刊，我接触到《西游记》和冰心的《寄小读者》等文学作品，开始萌发了对文学的兴趣。1932年初小毕业，考入余姚第一高等小学，1934年结业，我随长兄去上海自学半年，由他教我英语和算术，这对我后来专攻英美文学不无影响。”

“1935-1937年夏，我在浙江省立第四中学（即宁波中学）初中部学习。宁波是个著名商埠，宁中以师资雄厚著称。这三年，我受到全面的德智体教育。我认真听讲，努力学习，年年获得奖学金，使我的语文和英语打下了初步基础；我参加校刊的编辑工作和学术辩论会，增长了实际工作能力；我参加童子军活动和球类比赛，练出了一副结实的身躯。我开始新诗习作也是在这个时期。”

袁可嘉对自己“男孩”形象的描画，是粗线条的，显得有些笼统，缺少细节。

关于庆德小学，从所见的资料看，这是袁可嘉父辈四兄弟合办的学校，当属私人办学，袁可嘉小时候的“结拜兄弟”屠勇（原名屠竹轩）晚年在回忆文字里提到，袁可嘉的伯父袁功成是清末的秀才，除了投资相公殿街上袁家产业外，“注重文化教育，与袁家其他兄弟在他屋后建了庆德小学，供袁家子弟及邻近孩子学习”；还说到一位乡绅许深洋曾协助袁家创办庆德小学并教书。

余姚读高小这一段，幸好有邑人孙群豪、童银舫选编的《乡魂》一书，收有袁可嘉写于1999年的怀念故乡的文章，让我们可以穿越时光，去走近一位90年前读书郎。

1932年，11岁的袁可嘉第一次远离老家去余姚县城读书，这对一个孩子说来着实是件大事。他回忆道，那时还不通汽车，交通全靠水路，半夜两点多起来，含泪和母亲告别，然后跟着一个家中帮忙的师傅走三四里路到相公殿坐船，要坐七八个小时才能到达余姚县城，一路上闷闷不乐，也无心欣赏沿途的景色。

但县城的生活对于一个刚从乡村出来的男孩说来，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袁可嘉的印象是，三十年代初的“虞宦街”，卵石铺的环形街道又宽阔又平整，两边商店林立，“普文明”是常去购买书籍文具的书店。这里提到的几个名称，现在余姚一带的人们听来是有些陌生的。翻了旧书才知道，“虞宦街”就是现在的“新建路”，那时早已是繁华的街市；而“普文明”是前清秀才邵循南1909年开设的一家书局，位于虞宦街火弄口，主要经营古今图书和教科书，也卖文具、百货、西药等。1941年余姚被日寇占领后，书局卸下招牌，抗战胜利后重新营业，并于1956年关闭。

讲到余姚县高小，袁可嘉说，那是当地的最高学府，房舍宽敞，师资雄厚，他专心读书，很快就当上学生会主席，主持每周一次的周会，主办学生壁报，加强了对语文学习的兴趣。他记得县高小有一位陈树滋老师是大学毕业生，和同学们情谊很深，毕业那年这位陈老师与学生江边话别，学生们依依不舍，唱着“长亭外，古道边”的骊歌，呜咽着和陈老师说再见。

那时候最让袁可嘉感到稀奇的，则是火车和电话。每逢星期日，他总要和同学们去候青门看火车喷着白烟轰隆隆隆隆地驶进车站，或者到校门外的钟楼去打电话玩。袁可嘉说，



学校师生关系很好，但孩子们总还有淘气的时候，一间宿舍的学生故意捉弄老师，在应当熄灯安寝的时刻突然大闹起来，老师闻讯赶来，一推门一脸盆冷水泼下来，湿了他半身，学生们则躲在床上哈哈大笑。

查阅旧书，余姚县高小的历史始于清末，姚人叶秉钧、史翊经于清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创办达善学堂，以原试院考棚“达善堂”为校址（县府会堂旧址）。这么一说，大概的位置就浮出水面了。至于名称，学校1912年称余姚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（简称县高小）；1935年据《小学教育规程》规定，县以下公立小学以校址所在地地名作为校名，因学校地处“府前路”，遂改名为余姚县立府前路中心小学。1958年秋改名为东风小学。东风小学后来是余姚师范的附小。这样基本把学校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了。

如今姚江畔的府前路历史文化街区（阳明古镇），新砌的大理石街面，竖着一些介绍姚城厚重历史的碑石，上刻有“府前路中心小学”等旧名。更可喜的是，那家“普文明书局”的牌匾，赫然出现在了历史文化街区，就在通济桥与舜江楼东侧。2020年，在“85后”青年甘赐杰的推动下，“普文明书局”再次挂牌，甚至复建了上世纪30年代普文明书局的经典场景。

历史以这样的方式，复原了。

1898年看来是一个重要的年份，袁可嘉接着要走进的宁波中学，也创立于此年，时名为储才学堂。1911年易名为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堂（后“学堂”改为“学校”）。1933年8月改为浙江省立宁波中学。都知道经亨颐先生是名校春晖中学校长，他于1923年至1925年还兼任过省立第四中学校长，并以“山间明月”“江上清风”分别形容“春晖”和“四中”，点出了两校不同的地理特征。

袁可嘉在回忆文章里说，宁波中学在甬江畔，可能是笔误。余姚江、奉化江在“三江口”交汇成甬江后通向大海，而宁波中学所处位置在奉化江畔。这块地拨给学校之前曾是官办造船之区。今灵桥路164号即为宁波中学旧址，此处立有“孙中山先生演讲处”纪念碑，1916年8月22日孙中山先生应浙江省立四中勋建侯校长电邀莅甬，当天下午在宁波中学讲堂发表演讲。

1935年，袁可嘉考入了宁波中学初中部，在这所当时的“浙东第一名校”度过了三年时光。这三年对于袁可嘉人（简称县高小）和身体的成长都是十分重要的。在袁可嘉的印象中，他们一早起来就在江畔背诵英语单词或做操，他也会经常到江边，或沿着江堤走走，看看江上来的船只；或倚着栏杆发呆，循着江水流向，想着更远的世界会是什么样。学校校舍宽敞，全部是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，高中部更是西式洋房。学校不仅有重课堂教育，而且重视课外活动，如组织辩论会、讲演比赛等，袁可嘉很热心参加这些活动，以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。

袁可嘉给人的印象是有些内向和安静的。但从袁可嘉晚年的回想文字中，我们分明看到了与原本印象不太一样的“少年袁可嘉”形象：学霸，爱运动，很活跃的学生头头。袁可嘉的主体意识应该是这几年里觉醒的。学校配有篮球场、排球场和一个足球场，袁可嘉说他因为个头小、速度慢，哪一门都不是好手，但他样样参加，觉得竞争是一种乐趣，能培养人的志气和毅力。在童子军活动中，他还是一个班级的中队长，参加过本省和全国的大检阅。他多次参与危险的救火演练，如从十米高台向下跳，当时他已患近视，并不适合这类高难度活动，但他觉得既然老师选拔了他，就一定要做好。袁可嘉清晰记得，有一年秋天他们去奉化雪窦山露营，刚到达营地，突遇暴风

雪，帐篷怎么也搭不起来，大家浑身湿透，又冷又饿，最后做出了一锅夹生饭。第二天上山玩，又遇到一件险事，一个小同学不慎失足，滑到了一股瀑布的底下，挣扎着往上爬，又被冲了下去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同学们集合起来，想法子救他，终于想到身上带的童子军绳，立刻把几条绳子连接为一条长绳，奋力把他拉了上来。

读到这里，原来对袁可嘉的刻板印象消失了，眼前出现一个个子不高但时时活跃在球场和其他公众场合的男孩。

鲜为人知的是，他还曾与两位要好的男孩一起有过“三结拜”的经历。屠勇先生在文章里说，一个假期里，他和袁可嘉一起住在许家，就是前面提到的协助袁家创办庆德小学的乡绅许深洋家。许家的大儿子许青航（原名许惠民）比袁可嘉大一岁，是庆德小学的同班同学。屠勇比袁可嘉小三岁，幼年时就喜欢跟着袁可嘉。三人寒暑假常在一起玩，想到老一辈的“三结拜”关系，他们三个也想来个“三结拜”。结拜要有仪式，他们就各执一块绣有标记的手帕作为信物。想起学校童子军的训词“智、仁、勇”，不知谁倡议三人改名，分别叫袁智、许仁、屠勇。屠勇还忆及1937年春天浙江省第五次童子军检阅大会的事，那时袁可嘉代表宁波中学童子军，屠勇是余姚第一小学童子军，两人都随学校参加了这次大会，检阅完毕晚间在西湖边跳集体舞并露营万松岭，最后参观航空学校第一次登上飞机，令他终生难忘。

对于袁可嘉在宁波中学学习生活的想象，更多来自一首诗的发现。

学界一般都认为，1941年7月20日发表于重庆《中央日报》的新诗《死》，是袁可嘉的第一首诗作。袁可嘉自己在《半个世纪的脚印——袁可

嘉诗文选》“自序”开头，也把1941发表第一首新诗算作“笔耕”生涯的起始。最近“中国作家网”读到一篇文章，西安交通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曾祥金有了新发现：1935年第6期《宁波中学生》刊有署名“袁可嘉”的诗歌《奉化江上一瞥》，未见于《袁可嘉诗文选》，也不见其他研究者提及。全诗照录如下：

空中袭来一阵狂风，
浑浊的水开始动荡，
一波未伏，一浪又起；
阳光映着，
起伏处发出闪闪的光亮。
张着红黄色帆的渔船，
一艘艘逐浪而来；
水手们停止了划桨摇橹，
安静地蹲在船尾吸烟，
——一刹那的麻醉，安

慰！

夹岸从树中，
不见飞鸟飞逝；
夕阳徐徐向西坠，
翘首更见袅袅婷婷的炊烟。

人张开两臂，打了个呵欠，
轻轻的说：“一天又付诸流水。”

据曾祥金考证，《宁波中学生》于1933年创刊，半年刊，由浙江省立宁波中学自治会出版部编辑发行。袁可嘉曾在《自传》里说，宁波中学三年使他的语文和英语打下了初步基础，还参加校刊的编辑工作和学术辩论会，“开始新诗习作也是在这个时期”。袁可嘉提到的校刊是不是《宁波中学生》还不能确证，而《奉化江上一瞥》是这一时期袁可嘉的“新诗习作”应该是没有疑问的。重要的是，《奉化江上一瞥》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袁可嘉最早公开发表的诗作，比此前学界认为的他的“第一首诗”整整提前了6年。袁可嘉发表此诗时才14岁，它的发现对于我们了解袁可嘉早期创作及其诗歌风格的变化，是很有意义的。

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少年袁可嘉沿江堤迎风漫吟的情景了。夕阳西下时分，狂风逐浪，奉化江上波光粼粼，张着红黄色帆的渔船快要接近岸边；水手们经过一天的劳作，开始蹲在船尾吸烟休憩；炊烟袅袅升起，人开始打呵欠，一天又要过去了。少年袁可嘉站在奉化江边上，目睹了这样的情景后，心生感慨，写下了这首诗。袁可嘉的故乡是个靠近大海的地方，相公殿的河道上常见出航的船只，他求学的宁波中学就在江边，于是帆船、出航、潮水等意象经常出现在袁可嘉的诗里，40年代后期发表的《涨潮》《出航》等都是如此，而这首《奉化江上一瞥》则是更早的代表。与成名后的现代派诗风不同，这首《奉化江上一瞥》在如实描写现实场景的同时，融入了古典诗的象征和境界。此诗显示了诗人较好的写作才能和天赋，代表着袁可嘉诗歌创作的起步。

1998年9月宁波中学喜逢建校百年大庆，袁可嘉在文章里说，他写了祝贺信，赠送了自己的两本译作，但因身在海外，未能躬于其盛，深感遗憾。

袁可嘉《自传》说到宁波中学初中毕业后的人生经历，这样写道：“1937年7月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我原已考入浙江省立杭州高中，却因战事关系，未能入学，退回老家在庆德小学教书一年，业余从事抗日宣传活动。”

抗日烽火燃起，青年学生纷纷投笔从戎的浪潮下，1937年10月间从医回家的许青航（原名许惠民）先去浙江内地丽水受训，时年17岁。第二年，17岁的袁可嘉也去内地从军了……

松子书话

近水楼台先得书——王孙荣新著《余姚进士录》快览

吴铁佑

出了《慈溪进士录》，在写《余姚进士录》，见面有时会问问他，写得怎样了？也像是一个问候。

七月底的一个傍晚，中伏暑热难当，朋友圈看到了出书的消息，《余姚进士录》，出版了。

我近水楼台，当晚王孙荣出了办公室就径直来我家送书。两部进士录，都是他题签送书上门，虚长一轮，敬我铁老，实惭愧得很。好在意趣相投，平日一有收藏，就相展欣赏对晤，消磨半日，也当平常了。今天除了进士录，还带来新收乡贤洪不漠手书的一副对子呢。

接书，《余姚进士录》开本比《慈溪进士录》大，绿封皮精装，收入“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”，中国书籍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。

余姚两地的地域历史亲缘，行政区划改动频仍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历史上不可分割。常戏言王孙荣是两地的“双栖”，他两地跑，余姚、慈溪的历史研究都有他的踪影。但本身余姚就是交集着的。事实上，他孩提时候生活的半径，伍梅和隔河相望的孙家境在他出生前便是姚境，他出生的第二年1979年九月才划归慈溪，这比第一次慈溪改区1954年区划调整还迟了二十五年。他是住在烛溪湖湖畔下桑园里看着戴红缨、纱帽的祖容像，童年更在“官帽八百顶”的孙家境度过。“许多余姚进士与我有着血缘上的亲近，地缘上的接近，我既有一种忝为乡里的荣誉感，又有一种不自量力舍我其谁的使命感，我甚至希望通过写作能够延续一种超越时空的精气神。”正是这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感，他终于完成了余姚两部进士录。

写“进士录”并不是古今资料的简单汇编。编者必须有所取舍，“写出简赅、密实、规范的小传，实现与前史的无缝对接，是须细致考量的。对比两部进士录中的互见部人物，可以发现作者对小传在细微历史信息的用心打磨与补充。”

余姚素称“文献名邦”，修志修谱之风极盛，但这些方志、家谱不免“互相抄袭，随意编造”，特别是家谱，“出于各种动机，中国的新旧家谱存在大量编造、篡改的史料。”长此以往，余姚方志中的选举志和科举名录就显得非常混乱。进士录编著者责任重大，需要正本清源。他以旧志科举录为底，一一考证，采取三种处理方式，“实为进士科名延误者”列入正科名，“确为伪造窜入者”列入附录之中，“进士传记有所矛盾者”直列其中，

溪上书话

三伏晒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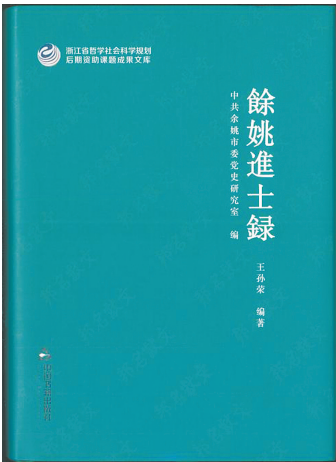
张春波

延绵几天的雨停了，出梅入伏，郁闷的心情消散，绽放出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的味道。

伏天，刚烈的阳光倾泻而下，人们晒“龙袍”，晒豆豉酱，晒书，晒霉晦的心情，晒精神萎靡的灵魂……“三伏乘朝爽，闲庭散旧编”，这是古代文人晒书的闲情逸致。对我来说，三伏晒书早已是童年的记忆，因为如今住楼房且通风好，书柜又放有干燥剂，书籍很少发霉了。

儿时，家居青瓦平房，屋中有一个竹制的书柜，层层叠叠地堆放着杂志、小说、连环画等书籍。梅雨时节，整个房间十分潮湿，更有一股书的霉味在空气中萦绕不散。每每这时，母亲便会说：“等梅雨一过，这书也得晒晒伏了。”

于是，在一个进伏的午后，阳光明媚但不灼热，晒书正适宜。先在家门口将一块木门板放好，然后，母亲把书架上的书一摞摞地抱出来，我将书一本一本摊在木板上。待书全部放好，母亲开始检查，发现有发霉现象的，就用半湿不干的抹布擦掉书上的霉斑；发现书有折皱、卷角的，就放在一块光洁的磨刀石下，将书压平整；发现书有脱页、破损的，就用胶水粘补修复。这个时候，我蹲在地上，边翻晒、边阅读，感到膝盖有些酸痛，便索性席地而坐，思绪随着书上的文字，遨游四海，纵横古今。



若难有定论，则存异待考。书后附编有“析异”“存疑”“辨误”，这就明明白白，老老实实，清算了原来的一笔糊涂账，也像打了一场笔墨官司。这种质实求真的文风是应该嘉誉和提倡的。尽管家谱文献有诸多不可靠，但书中有些“谱牒进士”也予以采信，他绝非随意采入，往往通过宗谱等旁证给予落实。本书“以碑传、宗谱中的生年，与科举录中的年齿对勘，纠正了不少疏误。”所以称道这本书“纠文献之谬，续家传之风”，是硬碰硬的“研究”。

这本《余姚进士录》还“对历代人物考证出其居里者，皆著录现属镇、村”，这样，本书的实用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。也可见作者在发挥本地文献整理的地域性优势上的努力和深度工作。“先前《慈溪进士录》在现境进士中对此有较好贯彻，但在旧境进士中仍有所遗憾，而这种遗憾在今日《余姚进士录》中有了弥补。”这就是两部进士录，“一部比一部好”。

记得王孙荣乔迁中兴小区与我为邻时，他的《孙月峰年谱》刚刚出版，这样就十余年了。现在余姚进士录成了双壁，在严谨、规范、深入的学术框架内，一部比一部好。著作等身未必，业界的看好和看重是明摆着的。

读正文前，喜欢先翻翻前言后记。两个序的作者都是惺惺相惜的专业人士，写的是干货，对著作条分缕析，是切中肯綮之作。王孙荣的前言后记，记载了书的缘起，交代了各种因缘巧合。话说文史不分家，在后记里，作者情不自主，文艺生焉。伍梅桑园，龙南孙境，地缘血缘，各种交代。新城河边的打桩声我也听得清清楚楚，感同身受。端的是一篇好散文。

舍我其谁，不辱使命，夙愿终了。作为一个隔山的行外人，我只有两个词，欣悦与恭喜！

投稿邮箱：1840973024@qq.com